

數字人文與世界文學： 重釋“歌德與世界文學”一案*

姚達兌

[提 要] 借用數字人文的研究成果,結合近代中國文學外譯和傳教士文獻,或可重新討論“歌德與世界文學”一案。莫雷蒂用遠讀的方式為 1740~1900 年間英國小說分出了 44 種主要類型,其中“求愛小說”這一類持續時間最長。莫雷蒂對求愛小說的數據分析結果,可借用以重新理解近代中國文學英譯的情況,尤其是《花箋記》、《好逑傳》等書的翻譯和再造的複雜情況。此外,歌德之所以會讀到這兩部二三流中國作品的英譯,取決於中國市場,也受英國市場的影響。遠讀分析的結果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證明,同時也建立起湯姆斯、帕西與歌德的聯繫。這些同時也附證了莫雷蒂的一系列世界文學猜想。

[關鍵詞] 歌德 世界文學 數字人文 莫雷蒂

[中圖分類號] I0-05;I1 [文獻標識碼] A [文章編號] 0874-1824(2020)03-0156-07

一、小引

許多保守的人文學者對數字人文的第一個反應是:迄今為止數字人文的研究並沒能改變現有學術風貌,使用數字人文方法研究出來的結果,用傳統的方法照樣能做得出。其實,數字人文的學界已產生了一系列的論著,雖未被廣為接受,但已頗具影響力。傳統學科若能與數字人文研究互動,借用其新工具、新方法,甚至是由其產生的新材料,或許可以為舊問題或學術懸案帶來新的解答。筆者僅借用現有的數字人文研究結果來重新理解“歌德與世界文學”一案。此文為舊題新作,一方面是“重審過去”,即使用新的材料(數字人文的成果和新發現的材料)來重新審視過去爭議頗多的個案(這也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領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),得出新的解釋;另一方面則是“朝向未來”,即希望世界文學的研究者不僅僅使用傳統的方法和傳統的材料,而應向其他學科/領域學習,取長補短,發揮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在人文領域向來具有的先鋒性。現在的世界文學研究,已經是一項合作的事業。正如莫雷蒂所說:“沒有集體合作,世界文學終將還只是海市蜃樓。”^①

* 本研究得到中山大學“西學東漸文獻館”和廣州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“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中心”的支持。

二、“歌德與世界文學”事件重探

愛克曼《歌德談話錄》裡記載：1827年1月31日，歌德提及了他最近讀到許多東方文學作品，“特別是一部中國傳奇，現在還在讀它。我覺得它很值得注意。”隨後，歌德又說，“我愈來愈深信，詩，是人類的共同財產。……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，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。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的早日來臨。”緊接着他談及了一些中國小說的情節，“又說有一對鐘情的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守……”^②

據相關材料考證，在1827年1月29日，歌德從魏瑪公立圖書館(Weimar ducal library)借出了一些書，其中便有湯姆斯(Peter Perring Thoms, 1790-1855)所譯《花箋記》(*Chinese Courtship*)一書，到了1月31日這天，歌德的日記裡提及了他與人討論一首中國詩的特征，而在2月2日的日記裡他還記錄了他在研讀一首中國長詩(*Studium des chinesischen Gedichts*)。^③這幾天的日記裡，歌德提及的這首“中國長詩”便是《花箋記》，因為湯姆斯將該書譯為敘事詩體，也稱該書是“一首中國長詩”(《花箋記》是一種粵語彈詞作品，以七字韻文寫成，可演唱，具有敘事性，故可用“小說”文體來翻譯)。歌德借出這本《花箋記》，經過反復研讀，直到同年的6月14日才歸還圖書館。歌德提及《花箋記》時，有時還稱其為“小說”(法語的“roman”，也譯為“傳奇”)。筆者認為這是受法國漢學學者雷慕莎的影響。1826年，雷慕莎(Jean P. A. Rémusat, 1788-1832)在為湯姆斯譯本所寫的評論中，既將這個譯本稱為“一首詩”，也稱其為“小說”(roman)。歌德受其影響，也使用該詞來指稱《花箋記》，因而我們看到漢譯《歌德談話錄》中將這本書也說成是一部“傳奇”。^④

關於這個事件，學界存在着一些不一致的說法，筆者在研讀了一些第一手材料，重新整理整個事件相關的種種線索之後，有如下幾種發現：一是歌德在其當時日記中提及他閱讀的中國小說是英譯《花箋記》，而非《好逑傳》，儘管前者的英譯名(直譯：中國式求偶)與後者的漢語意思相近。二是歌德還談到了小說中一對年輕男女被迫共處一室，但是兩人一直嚴守禮教、貞潔自持——這個情節應該是來自於《好逑傳》而非《花箋記》。三是有學者指出歌德當時讀的是(或說還讀了)《百美新詠》一書，更準確的說法是英譯《花箋記》一書的附錄《百美新詠》，兩者是裝訂一起的一本書。^⑤四是1827年2月14日，歌德還讀了法譯本的中國故事選集和雷慕莎的法譯中國小說《玉嬌梨》。^⑥另外，從歌德與愛克曼對話的上下文語境中可知，歌德在此前早已讀過《好逑傳》的帕西英譯本(1761)和馬若瑟法譯本(1766)，在此後還可能讀過1828年出版的另一個法譯本《好逑傳》。^⑦

在這裡有一個容易被人忽略但又較為重要的問題：歌德在提及世界文學時，閱讀討論的為何是像《好逑傳》、《花箋記》、《玉嬌梨》這樣一類的作品？這三部作品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只能算二三流的作品。在同一時代或更早，中國已產生了遠比這三部作品更偉大的小說，比如《西遊記》(最早版本為萬曆二十年即1592年百回本)《金瓶梅》(明代萬曆年間已有幾種刻本)和《紅樓夢》(乾隆五十六年即1791年第一次刻板印刷)。

現在學界認定歌德在提及“世界文學”時讀到的主要是這三部作品：《玉嬌梨》、《好逑傳》和《花箋記》。這三部小說所涉都是男女戀愛故事。從歌德的日記可判斷是《花箋記》，然而從愛克曼的記錄中歌德談論的小說情節判斷則可能是指《好逑傳》，故而這兩部書更為重要。再者，《花箋記》後附《百美新詠》涉及的不僅僅是美貌的傳奇女性，而且是有德行的女性——這與我們後面討論也有關係。《玉嬌梨》(雙美奇緣)與《花箋記》，都是講一男兩女的戀愛故事，未必完全符合基督教世界讀者的道德趣味。歌德讀到的《好逑傳》由英國聖公會大主教帕西(Thomas Percy)譯成於

1761 年出版,內容是一男一女的戀愛故事。兩人經歷了“邂逅——磨難——團圓”的過程,這類似於道德獎勵或救贖的敘述模式。而且,更重要的是男女主人公的最終完滿結合,是借助皇權聖諭這種外在的、不可抗拒的力量——類似於超越的基督教上帝,故而該書可能更受歐洲讀者喜歡。

三、莫雷蒂的圖表和分析結果

理清以上基本事實後,我們再引入數字人文相關的議題。2000 年後,莫雷蒂可謂是重新定義了“世界文學”並為這個學科提供了新的方法論。他在其開拓性的專著《圖表、地圖、樹圖》中使用了一個副標題“為一種文學史而建的多種抽象模型”。那些抽象模型正是數字人文分析的方式,而其結果則在於改寫文學史,或者重寫一部世界文學史。在該書“圖表”一章中,莫雷蒂採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來研究 1740~1900 年間英國小說的發展狀況。數據方面,他依賴的是這一時段的一百餘項研究成果/專著,而每一項成果中包括了大量的作品統計和細讀分析。^⑧莫雷蒂對這一時段英國小說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,而對數據的處理則呈現為一系列的可視化圖表。筆者在這裡借用他的圖表,將其轉換成描述性語言,來討論英語世界的小說狀況,並延伸印證歌德的談話。

該書中所附的圖表 9 表示,^⑨這 160 年間英國小說主要有 44 種類型,其中“求愛小說”(Courtship Novel)這一類型持續存在的時間最長——從 1740 年開始流行直至 1820 年代餘波仍在。該書所附圖表 10 中,^⑩莫雷蒂結合了凱瑟琳·格林的專著《求愛小說,1740~1820:一種女性化文體》^⑪中的分析結果,得出如下一種結論:這一時段的“求愛小說”可分為兩類,1740~1780 年間的英國求愛小說主要強調一種關於“貞潔”的超越性原則(the transcendent principle of chastity),而 1780~1820 年的則強調一種關於“風俗”的根本而內在的觀念(the fundamentally immanent notion of manners)。這種二分法可略稱為“貞潔”(chastity)和“風俗”(“manner”,還可譯為“禮儀”“品行”“生活習慣”)兩種。前者關乎於宗教或道德教化下的男女的貞潔品德,而後者則指向啟蒙時代以降的一種觀念:民族的風俗與其民族精神密切相關。莫雷蒂得出的這一結論,是建立在大數據和遠讀的基礎上,而且其研究充分地利用了傳統學術方法得出的研究結果——比如參考了一百多部相關的學術專著。

莫雷蒂的分析結果,我們可再次利用,以便解釋歌德為何會讀到那兩部中國文學作品。1827 年的 1 月 31 日,歌德對愛克曼提及中國小說和世界文學時,還深有感慨地說了如下一番話:

(在中國)一切都比我們更明朗,更純潔,也更合乎道德……又說有一對鐘情的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守,有一次他倆不得不同在一間房裡過夜,就談了一夜的話,誰也不惹誰。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。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,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,而且還會長存下去。……我看見貝朗瑞的詩歌和這部中國傳奇形成了極可注意的對比。貝朗瑞的詩歌幾乎每一首都根據一種不道德的淫蕩題材……請你說一說,中國詩人那樣徹底遵守道德,而現代法國的第一流詩人卻正相反,這不是極可注意嗎?^⑫

這裡提及兩男女貞潔自守的情節,比較明顯地對應了《好逑傳》一書。我們隨便翻一本介紹《好逑傳》的書,便可發現類似的描述。周鈞韜、歐陽健所編的《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》對此書的簡介中便有一句:“這對獨男孤女,同居一處,卻隔簾相見,不以情廢禮,無半語及於私情。”^⑬這裡強調的是“貞潔”,正好印證了莫雷蒂的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,而且該書的英譯出版時間(1761)也落入了莫雷蒂劃分的第一個時段(1740~1780)。

然而,美國學者萊斯利·奧貝爾(2018)認為,這個情節與英譯《花箋記》的情節完全對應。¹⁴筆者並不同意這種觀點。湯姆斯雖然大體上是忠實於原文,但有些情節做了微妙的改寫。《花箋記》中《誓表真情》(Oath of Constancy)一章,男女主人公梁生和瑤仙移步以花園中的看雲亭擺開香案,私訂終身。¹⁵此時梁生取出花箋寫下兩人誓言。這是關鍵情節,也是《花箋記》書名的來源。湯姆斯的英譯改成了兩人同處一室——他們移步到了房間中央(the centre of the room),而不是到看雲亭拜月許誓。在後續的情節中,兩人訂下盟誓後,梁生立即向瑤仙求夫妻歡愛,被她嚴辭拒絕。瑤仙自道願意與梁生私結終身,已是大違時俗,“若然迫我風月事,寧捨殘軀謝古人”。梁生後又以死相迫(“料知別姐難長久,這回一定死歸陰”)。瑤仙回道:“自小極嫌淫賤婦,無媒苟合敗人倫。殺身誓不從郎命,堅心留待洞房春。”瑤仙堅決不從,誓守處子之身。“梁生見姐唔從順,只得含愁伴姐坐花蔭;兩家談笑如膠漆,不覺城頭播五更。”對比湯姆斯的譯文,梁生先是動之以情,後是表現得愁眉苦眼,甚至想以離別和死亡脅迫瑤仙與其歡合——這些情節在英譯本裡都得到了保留。故而,筆者認為《花箋記》的情節並不符合歌德所說的情節:“……有一次他倆不得不同在一間房裡過夜,就談了一夜的話,誰也不惹誰。”瑤仙毫無疑問是貞潔自守的道德典範,正如湯姆斯譯者前言中提及這是一位有德行的、堅貞的年輕女性。¹⁶然而,梁生卻有非分之想。

《好逑傳》的譯文是經帕西主教編改寫後於1761年在倫敦出版。帕西深知《好逑傳》一書並不是最好的作品,甚至存在着情節方面的缺陷,但是他在寫給他人的信件中指出,“‘在這個國家充斥着最放蕩的、不道德的虛構敘事之時’,來自中國的這一奇異作品具有其道德上的價值”。¹⁷在帕西這裡,英語文學中存在着大量的最放蕩的、不道德的小說,而《好逑傳》正好是其反證,可提供給英國讀者以一種道德上的教益。這當然頗為符合他作為聖公會大主教的身份。對照起上文提及的歌德的話便可發現兩者存在着驚人的相似性:歌德也借“這部中國小說”來批判法國文壇充斥着不道德的、淫蕩的題材的詩作。無論是帕西還是歌德(兩者可能借助的是同一部作品)都是借遠方他者(即翻譯的中國小說),來批判歐洲流行一時的英語或法語的文學作品。

四、澳門和傳教士文獻

《好逑傳》和《花箋記》兩書均由廣州至澳門傳出而走向世界。《好逑傳》一書的最早英譯來自澳門,原稿完成於1719年,後經由常駐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職員詹姆士·威爾金森(James Wilkinson。此君也可能是手稿的譯者或譯者之一)之手輾轉至帕西手中。¹⁸帕西將得到的手稿重新編輯、大幅度改譯改寫後定型,於1761年正式出版。歌德讀到的另一部作品也與澳門相關。1824年,《花箋記》是由在廣州和澳門活動的英國人湯姆斯譯成出版。湯姆斯是澳門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印刷工。因而我們可推斷:近代由廣州至澳門再向外傳播並流通於歐洲市場的外譯中國文學,乃是歌德“世界文學”事件得以發生的前因。

歌德讀到的《花箋記》是1824年湯姆斯在倫敦出版的英譯本 *Chinese Courtship* (請注意,譯者是在澳門譯成、而在倫敦出版的,這中間會有時間差)。首位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)的《華英字典》(1815-1823)便是由湯姆斯排印出版。¹⁹1817年,湯姆斯排印了這一本字典前幾部分,在字典後附有馬禮遜所撰的另一本小書《中國大觀》(*A View of China*)。在該書中,馬禮遜提及了帕西英譯本《好逑傳》,指出其譯書名為“A Pleasing History”,與此同時馬氏自己將《好逑傳》的書名標題翻譯成了“Happy Courtship”。²⁰馬禮遜的這個譯名在音義上更佳,在字義上要比帕西的音譯或意譯為“A Pleasing History”更接近於漢語的意思,而且在讀音上粵語“逑”字

也與英語“court”一詞相近。另外，馬禮遜應該了解英國此時流行的正是“求愛小說”這一種類。馬禮遜的《中國大觀》經由湯姆斯在 1817 年編排出版，由此可見湯姆斯在 1817 年着手《花箋記》之時，應該知道甚至是已看過帕西譯本。湯姆斯將《花箋記》的書名英譯為“Chinese Courtship”（中國式求愛），便是受啟於帕西英譯本《好速傳》以及馬禮遜對該書書名的重譯。

1820 年，湯姆斯還將《今古奇觀》中的一篇小說《宋金郎團圓破甑笠》譯為《深情的一對》（*Affectionate Pair*）在倫敦出版。²¹湯姆斯所譯的《花箋記》和《宋金郎團圓破甑笠》等作品，都來自於馬禮遜的藏書，而馬禮遜的中國小說多數來自於廣州“河南”（今海珠區）海幢寺的印刷所，因為海幢寺是禁教時期外國人極少數能去的場所之一。換言之，馬禮遜和湯姆斯可獲得的（available）書籍便是像《今古奇觀》、《花箋記》這一類的書籍，這是由禁教時期獨口通商的廣州書肆所決定的，但是湯姆斯將《花箋記》和帕西將《好速傳》翻譯成當時英語世界可接受的（acceptable）文體風格，即英國流行一時的求愛小說的樣式——這是受英國市場所影響的。

湯姆斯在《宋金郎團圓破甑笠》譯文的前言中指出，這個故事中的人物來自底層，故事本身並不涉及重要議題，“但對那些希望獲得有關中國習俗和禮儀（Chinese customs and manners）相關信息的人而言，這可能是一個有趣的故事。因為它揭露了中國最流行的教派之一的宗教觀念——儘管它所呈現出來的，與歐洲正好完全悖反，但它還是顯示出了中國人並不缺乏仁慈、憐憫和愛心等美好情感”。（筆者所譯）²²請注意，湯姆斯在這裡強調了這篇小說的風俗方面的特征，同時他還借用了此書來進一步作中西比較。這篇小說對“中國習俗和禮儀”的強調，正好對應了上述莫雷蒂對這一時段英國“求愛小說”分析的結果，即第二種主題“風俗”。這樣情況與帕西英譯《好速傳》頗為類似，湯姆斯正是受到帕西英譯《好速傳》的影響而特意彰顯出這樣的主题。

《好速傳》和《花箋記》這兩部小說都是按照當時流行的英語“求愛小說”的文體來翻譯的。兩個譯本都呈現出了種種驚人的改寫，以求符合當時的潮流、閱讀或審美的趣味。例如，為了闡明歐洲不常見的中國風俗（the uncommon customs and manners of China），帕西在英譯《好速傳》中加入了許多注釋，以至於當時的評論者，以及給他來信的朋友都提及他的注釋對這個譯本而言是何等重要。“帕西在英譯本中加上泛濫成災的腳注，有些甚至連綿數頁，旁搜遠紹，提供大量例證闡述中國秩序系統的各個面向。”²³帕西在注釋中至少引用了 26 部在歐洲出版與中國相關的作品。這些注釋作為副文本加上與其互涉的早期文本，正可看出歐洲東方學的生產方式。這正印證了穆夫提對 18 世紀歐洲文學的觀察後得出的結論：“World literature is Orientalism, it is inseparable from it.”（世界文學便是東方學，兩者難分彼此。）²⁴數字人文學者若能對帕西的譯文注釋中提及的所有相關作品，作一種定量分析，並結合細讀作深度批評，或許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。

五、小結

莫雷蒂經由遠讀分析而得的求愛小說的二分法（貞潔 vs 風俗）其實也不是完全確切無誤，我們可用細讀分析來進一步驗證。帕西譯本在二分法歸類中應屬於“貞潔”一類主题，這個譯本也確實存在着這一方面的內容。但是在此之外，這個譯本還兼及了“風俗”的主题，甚至可說“風俗”的主题更為重要。帕西譯本一再提及了“風俗”（manner）。前輩學者經過細讀和深入分析後已指出，帕西如同啟蒙時期偉大哲學家（比如伏爾泰撰《風俗論》）一樣，“也關注的是民族的‘moeurs’，以及風俗背後隱藏的民族精神與心態”。²⁵法語詞“moeurs”，可譯為英語詞“manner”，也即“風俗/習俗”。帕西在其編譯的《花箋記》首頁（四卷每卷都有），還征引了杜赫德《大中華帝國志》（*Descrip-*

tion de la Chine, II, 258)一書的句子作為點題證明：“沒有比中國本身更好的向中國學習的方法了，因為肯定不會被那個國家的天才和習俗所欺騙。(Il n’y a pas de meilleur moyen de s’instruire de la Chine, que par la Chine même: car par la on est sûr de ne se point tromper, dans la connoissance du génie et des usages de cett nation.)”或許這個譯本是莫雷蒂和格林的二分法分類的一種例外，因為這個譯本在情節和主題上兼具了“貞潔”和“風俗”兩方面的書寫。但這問題不大，因為以上的討論足夠證明了如下幾點：一是歌德之所以會讀到這兩部二三流中國作品的英譯，取決於中國(廣州)市場，也受英國市場影響。二是譯者(帕西和湯姆斯)需要借助遠方他者來批評英國文學，因而將其改寫成了其本土流行的求愛小說風格，暗藏了批判時世的觀點。三是遠讀分析的結果提供了一種證明，同時使得湯姆斯、帕西與歌德在當時的世界文學交流網絡中建立了聯繫。四是這兩部作品的翻譯和跨國流通——從廣州到澳門(東印度公司)到倫敦，再到晚年歌德所在的德國小鎮魏瑪，說明在19世紀一個文學的世界市場已經成熟。這同時又附證了莫雷蒂一系列世界文學猜想中關鍵的一點：18世紀世界市場形成，由此而分出前後兩類世界文學，前者以樹圖為主要特征，後者主要以波浪為主要特征。“求愛小說”正是當時英國乃至歐洲市場上最有力量的一股浪潮。

簡言之，上述“求愛小說”的例子借用了數字人文的分析結果，來重審歌德與世界文學一案。《好逑傳》和《花箋記》的翻譯和流傳，還印證了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跨界流通和再生的描述，^⑤而歌德讀到這兩部二三流作品，則印證了莫雷蒂所說18世紀後世界市場中世界文學/文類的波浪形擴散特征。^⑥

①② Franco Moretti, *Distant Reading*, London: Verso, p.111, pp.59-62.

③④ 愛克曼輯錄：《歌德談話錄》，朱光潛譯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113頁；第112~113頁。

⑤ 陳銓：《中德文學研究》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12頁。Leslie O’Bell, “Chinese Novels, Scholarly Errors and Goethe’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,” *Publications of the English Goethe Society*, Vol. 87, No.2, 2018, pp.64-80. 萊斯利·奧貝爾(Leslie O’Bell)結合德國學者和歌德日記等材料判斷，以下日期1月29和31日、2月2~6日(一共七天)都或明或暗地提及了英譯《花箋記》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德語系盧銘君教授代筆者翻查並核對法蘭克福版《歌德日記》，謹在此表示感謝。Johann Wolfgang Goethe, *Die letzten Jahre: Briefe,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von 1823 bis zu Goethes Tod*, Die Herausgegeben von Horst Fleig.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, 1993, p.448.

⑥ Abel-Rémusat, “Hoa-Tsian: 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,” *Journal des Savants*, Feb 1826, pp.67-68.

⑦⑧ Peter P. Thoms, *Chinese Courtship*, London: Par-

bury, Allen, and Kingsbury, 1824, pp.249-280, vi.

⑨ Jean P. Abel. Rémusat, *Iu-Kiao-Li, ou Les Deux Cousines*, Paris: Librairie Moutardier, 1826.

⑩ 馬若瑟譯本：Joseph Première, *Hau Kiou Chooan, Histoire chinoise*, Traduite de l’anglais, Lyon: Chez Benoît Duplain, 1766. 第二個法譯本情況如下：Eidous, Marc Antoine, tr., Thomas Percy, James Wilkinson, *Hau-kiou-choaan: ou L’union bien assortie; roman chinois*, Paris: Moutardier, 1828. 兩個譯本都是據1761年帕西英譯本轉譯。該書還有德語譯本(1766)和荷蘭語譯本(1767)。“它(此書)在歐洲的影響相當持久。德國大詩人席勒曾着手重譯，但未完成；1829年英國也有了達維斯的英譯本。”(按，達維斯即 J. F. Davis, 德庇時)，見許正林：《傳播理念的核心與邊界》，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9年，第259頁。

⑪ Franco Moretti, *Distant Reading*, pp.179-210.

⑫⑬ Franco Moretti, *Graphs, Maps, Trees: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*, London: Verso, 2005, p. 19, p.23.

⑭ Katherine Sobba Green, *The Courtship Novel, 1740-*

1820: *A Feminized Genre*, Lexington, KY: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, 1991.

⑬周鈞韜、歐陽健主編：《中國通俗小說鑒賞辭典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483頁。這一情節詳參名教中人編次：《好逑傳》，鍾夫標點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49~56頁。

⑭Leslie O'Bell, "Chinese Novels, Scholarly Errors and Goethe's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", *Publications of the English Goethe Society*, Vol.87, No.2, 2018, p.69.

⑮薛汕校訂：《花箋記》，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28頁；Peter Perring Thoms, *Chinese Courtship*, London: Published by Parbury, Allen and Kingsbury, 1824, pp.107-113.

⑯T. C. Fan, "Percy's Hau Kiou Chooan", *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*, Vol. 22, No. 86 (Apr.)1946, pp.122-123, 117-125, 123.

⑰Thomas Percy, *Hau Kiou Chooan, or The Pleasing History*, 4 Volumes, London: Printed for R. and J. Dodsley, 1761.該書封面題有另一個標題“A Chinese History”(《好逑傳：一部中國歷史》)。此外這個譯本還有另一個副標題“A Pleasing History”，即一種歡愉的歷史。筆者認為帕西之所以為《好逑傳》取這樣一個副標題，是因為他企圖借這部小說來觀察/評估中國的風俗，乃至中國民族精神的狀況。當然，英語“history”或法語“histoire”一詞，在當時的語境中往往也同時指稱“故事”。感謝北京大學法語系王斯秧教授指出“histoire”一詞在當時可指稱故事或小說。T. C. Fan稱，在四卷版出版前還存有帕西改譯的三卷本譯稿，譯者可能是在廣州(Canton)的商人詹姆士·威爾金森。而到了通行的四卷本，帕西則自道是其編譯，所據版本是來自威爾金森文件中的譯稿——這個譯稿六分之五是英文稿，六分之一是葡萄牙語稿，而且整個譯稿錯漏很多，許多地方很難認，原譯者也不能確知。帕西將葡萄牙語譯文轉譯成英文，將原英文稿也作了一系列的調整和潤色，有一些地方還是他的改寫。T. C. Fan, "Percy's Hau Kiou Chooan," *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*, Vol. 22, No. 86 (Apr.)1946, pp.117-125.儘管帕西僅是重譯和重新編輯了譯文，而且此前杜赫德出版的《大中華帝國志》一書中已包含了多種中國文學作品的譯文，但

是帕西英譯《好逑傳》可算是第一部全本英譯的中國小說，因此確有其學術史上的重要貢獻。帕西英譯本出版後，很快在歐洲便有了德語、法語和荷蘭語等語言的轉譯本。參見Chen Shou Yi, "Thomas Perc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," in Adrian Hsia, ed., *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*, 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p.302-311。

⑱Robert Morrison, *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*, in three parts, Macao: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's Press, by P. P. Thoms, 1815-1823; 馬禮遜編：《華英字典》，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8年。

⑲Robert Morrison, *A View of China,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; Containing a Sketch of Chinese Chronology, Geography, Government, Religion & Customs*, Macao: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's Press, By P. P. Thoms, 1817, p.120.

⑳Peter Perring Thoms, *The Affectionate Pair, or the History of Sung-kin, A Chinese Tale*, Printed for Black, Kingsbury, Parbury and Allen, 1820, Preface.

㉑林凌瀚：《丟落在失/秩序坐標之外：〈好逑傳〉作為快感個案的時間性與劇場性》，曹虹等主編：《清代文學研究集刊》第四輯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3頁。

㉒這是一位學者在評論穆夫提的專著時引用的他的話。Františka Zezuláková Schormová, "Forget English! Orientalism and World Literatures by Aamir R. Mufti," *Twentieth-Century Literature*, 1 June 2018; 64 (2), pp. 259-264, 259; Aamir R. Mufti, *Forget English!: Orientalisms and World Literatures*, Cambridge, Mass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6.

㉓T. C. Fan, "Percy's Hau Kiou Chooan", *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*, vol. 22, No. 86 (Apr.)1946,

㉔David Damrosch, *What is World Literature*, 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03.

作者簡介：姚達兌，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廣州 510275

[責任編輯 桑海]